学术动态

“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春晨　冷东

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大学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于 2002 年 7 月 27 日 - 29 日在广州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代表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 60 余篇，会上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综论性综述

岭南是中原文化和古岭南文化、南亚文明和中华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处在中华文化边缘的岭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融合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作用。

香港大学赵令扬教授对岭南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及模式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的学术动态和新资料的发掘。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与社会、岭南与内地以及研究岭南文化的方法，进行了深刻阐述。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广州的改革开放与社会的变迁——兼论现阶段广州现代化建设的新内涵》一文，对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以及市民生活的改善各层面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变迁进行了全面论述。广州大学刘汉东教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一文，论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使外来文化和科技文明经过海路传入中国，岭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开放性、兼容性和不断提升发展的进步性。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论述了早期中美关系的内容，以及广州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起的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作用。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陈历明研究员论述了华侨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主力，湛江海洋大学刘明金、杨清华论述了中外文化交流与珠江流域价值取向的悄然变化，广州大学彭顺生论述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广州的传播及其特点，广州大学何薇论述了西关在广州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等。

二、明清及近现代

明朝以降，是岭南地区中外交流内容最丰富的阶段，在西方文化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一文指出，在清初近三十年的禁海政策下，澳门首当其冲，经历过异常艰难的

[收稿日期] 2002 - 9 - 30
[作者简介] 赵春晨（1942—），男，广州大学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冷东（1953—），男，广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405

时期。清中央朝廷与澳葡之间，广东勋贵官吏与澳葡之间，以及荷兰、葡萄牙、清朝三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澳门以弹丸之地，在此期间却关系着中外贸易交通、以至国际之间在东亚地区的风云变幻，是值得史家深入进行探索的。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寻求“中国的开放”——在华英文媒体与鸦片战争前的西方舆论》一文，指出鸦片战争前 10 余年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新兴强国在东方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迫使中国“开放”，即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西交往限于广州一口的旧格局，使中国广大的沿海地区向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开放。这种要求在英国等国的政、商、教会各界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影响日益增大的舆论，对英国等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压力和作用。在这种舆论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由在华西人在广州（及澳门）创办发行，反映西方官员、商人、传教士的英文报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四川大学谢放教授《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书院——以尊经书院和广雅书院为例》一文，以张之洞光绪年间先后在四川和广东创办的尊经书院与广雅书院为例，考察了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对近代书院及士人的影响，并比较研究了沿海和内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异同及其特点。提出虽然沿海地区总体上讲比内地更容易接受西学、新学的影响，但就获取功名的士人而言，在接纳西学、新学方面，地处沿海的广州比起僻居内地的成都，在光绪年间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地域优势。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宪政思想的传播》一文指出，梁启超是非常著名的岭南文化名人，也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的启蒙思想家。一生在诸多领域有成就，其中在宪政思想方面成就颇大。说梁启超为近代最大的法学家也不过分。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朱新镛教授《西方初探——广东文化近代化的起点》一文指出，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为首的地方大吏和以梁廷楠为首的广东爱国士人协同对西方世界进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战后，梁廷楠、林福祥、邹伯奇等以各自的论著，从不同方面对这时期广东学界探索西方的成果，做出了总结。这批广东学者开始突破了所谓“中国内外各为九洲”的传统地理观，揭开了广东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序曲。此外，中山大学曹天忠博士研究了中西文化交流下的近代两广教育，江西师大张英明对马礼逊、梁发、罗孝全、洪秀全进行了近代岭南中西文化交流个案研究，江西师大尹可雨以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为切入点，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分析了近代广东人才的特点及成因。

三、教会与传教士研究

在中国和西方不同历史渊源的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交汇的历史阶段，最先进入岭南地区的就是教会和传教士，继而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这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暨南大学李龙潜、陈忠烈教授《也谈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文章指出：从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来看，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激进派，主张用武力传教，暴露了配合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野心；另一派是温和派，认为在中国传教，需要了解和尊重，善意劝人入教，不应用武力来促其实现。因而客观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上海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一文，论述了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首要地位的并不是商品而是教堂文化，教堂文化首先在岭南地区登陆，并通过岭南沿着交通线北上，最终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一大重要的文化景观。华南师范大学林中泽教授《利玛窦与庞迪我的关系辨析》一文，涉及晚明来华耶稣会内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插曲，即利玛窦与庞迪我之间的矛盾，证明民族矛盾固然是影响二人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更潜在的原因应是二人在思想观念上的本质差异；利玛窦不是一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不见容于庞迪我，主要是因为他那种具有浓烈人文主义背景的工作方式与庞氏的传统中世纪传教模式格格不入。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关汉华《十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开拓性实践——罗明坚华南行迹考述》一文指出，罗明坚作为耶稣会赴华传教的先驱者之一，是第一位正式获准进入华南腹

地开辟传教区的耶稣会士，并将沙勿略、范礼安所奠定的“学术传教”和“本土化”的传教方针付诸实践。文中强调：由于罗明坚不仅打开了在华传教的局面，而且积极推行新的传教方针，从而使传教活动的学术含量大增，这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岭南地区近代化历程，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晚清广东教案述略》的文章指出，近代广东是教案的多发区，但为何没有发展成严重的中外交涉，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香港大学杨文信博士论述了雍正年间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岭南的发展与挫折，香港大学冯锦荣博士研究了利玛窦携带的西方科技书籍在中国的流播。广州大学雷雨田教授《大同教传行中国始末》一文介绍了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香港丘恩处先生分析了犹太教对以色列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基督教，广西师大刘祥学分析了西方传教士与明后期岭南政治的关系，嘉应学院韩小林分析了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四、人物研究

广东省社科院李庆新研究员对以往研究薄弱的郑和下西洋与广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刘圣宜教授《郑观应与中西文化》一文指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他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把两种文化置于平等地位。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总的倾向是中西融合而不是中西冲突和对抗。香港大学马楚坚博士的文章详细论述了罗香林、朱炎伉俪对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贡献。适逢中山图书馆九十周年之诞，这是一份可贵的献礼。

五、武器交流

广州大学赵春晨教授《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西洋武器浪潮》一文，对鸦片战争期间岭南地区面对英国凭借“坚船利炮”而发动的武装侵略，曾一度出现的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深刻反思。文章认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西洋武器活动之所以夭折，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原因。除了道光皇帝思想僵化、对西方科技持冷淡态度，以及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国人普遍的思想麻痹等原因外，岭南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自觉也是颇为重要的因素。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明末购募西炮葡兵缘由考》一文，以火器在明代应用过程中的教训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对“师夷长技以制胡”的分析。广州大学冷东教授《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一文指出，火药和火器不仅是一个民族力量的象征，而且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尊严。文章简要介绍了火药和火器在中国的发明和演进，进而在亚洲各地的传播。说明中华传统科学技术，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荟萃，她的兼容汇通等特质，又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医学交流

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盛永华和孙关龙教授的《岭南——西医东渐的中心》一文指出，由于1535年澳门开埠，以及广州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港口之一等条件，岭南在明清时期成了西医东渐的中心，中国西医学的发源地。主要表现为西医院的建立，西医术的传播，西药的推广和西医书刊的岭南孕生。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明清以来中医药学在欧美国家的传播》一文指出，中医药学历史悠久，曾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作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以降，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医药学，不断向欧美国家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岭南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起了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产生重大变化。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利于岭南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对当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促进改革开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